

# 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 從經濟起飛到政治民主

● 楊 沐

近半個世紀以來，東亞是世界各地中持續保持經濟高速穩定增長的唯一板塊，其秘訣在於東亞文明中具有學習和吸收外來知識的傳統，使之形成一個積極的知識受體<sup>①</sup>。但是，完成知識的快速轉移，僅有積極的受體還不足夠，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說，知識不可能輕易地被傳遞或「下載」到其他文明中去。這需要由「國際機構和當地的複合的互動體」加以推動<sup>②</sup>。本文欲說明的是，東亞經濟奇迹不僅清楚地顯示了這種互動過程，而且還在互動中預示了東亞未來的政治改革圖景。

## 一 東亞經濟奇迹中的「雁行模式」

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建立自己的新經濟體系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迅速、有效地利用國外或經濟體外的知識。從國外獲取知識的三個關鍵途徑是：貿易、外國投資和技術許可。東亞奇迹就是通過貿易的開放和投資的跨國(跨經濟體)轉移實現

了這種有效利用，日本經濟學家把它稱為「雁行模式」。

東亞的現代化是從日本開始的。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如過去曾向中國學習一樣，選擇了向西方學習，改造自己，推翻傳統的幕府制度，實行明治維新，全盤西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1905年一舉擊敗俄國。在加快發展的探索中，為了爭奪有限的國際資源和市場，錯誤地走上軍國主義之路。

中國受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也派了大量留學生到西方和日本學習。但由於戊戌變法失敗，以及民國初年推行民主共和政體中的挫折，以後又面臨軍閥混戰和日本侵略，救亡和對國家控制權的爭奪壓倒了知識的傳播和經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日本的軍事佔領強制性地促使了日本對西方知識和觀念的學習和融會貫通。日本是美國農產品、石油和煤的最大買主，因此它必須有更多的製成品出口美國，以獲取外貿的平衡。在1950、60年代，日本企業迅速學習西方的技術、管理和質量控制等方面的知識，

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建立自己的新經濟體系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迅速、有效地利用國外或經濟體外的知識。東亞奇迹就是通過貿易的開放和投資的跨國(跨經濟體)轉移來實現，日本經濟學家把它稱為「雁行模式」。

1950、60年代，日本的技術引進是通過購買美歐的專利和圖紙來實現的。這樣，歐美企業就無法通過直接投資來控制日本企業。這是朝鮮戰爭和冷戰時期，歐美想盡快扶植日本的發展，形成遏制共產世界的包圍圈，而給日本造成的機會。

以提高自己的產品出口檔次。從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的高質量產品逐漸佔領了美國和歐洲市場。日本實現了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個奇迹。日本的GDP總值在世界的排名，從1955年的世界第三十四位，到1968年躍居至世界第二位。是日本首先使世界看到了東亞在吸收和傳播知識方面的能力。

50、60年代，日本在改造老產業、發展新產業時，主要是花費大量外匯，從西方直接進口先進技術和設備。通過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實現知識的傳播。日本的技術引進偏重於專利項目，其中80%是通過購買美歐的專利和圖紙來實現的。這樣，歐美企業就無法通過直接投資來控制日本企業。這是朝鮮戰爭和冷戰時期，歐美想盡快扶植日本的發展，形成遏制共產世界的包圍圈，而給日本造成的機會<sup>③</sup>。

東亞各經濟體大部分都資源貧乏，人口眾多，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少，人均資源更是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對工業化有重要作用的礦產資源都需要進口；可耕地少、森林資源少、可供人居住的空間有限。在50、60年代，很多人都會懷疑這樣的地區是否具備發展條件。但60年代的越南戰爭和日本、歐美企業的技術升級，又給四小龍造就了機會，開始了東亞經濟增長的第二波高潮。日本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第一家投資，分別開始於1955、1960、1961和1965年。到80年代後期，隨着日元的不斷升值，日本的投資迅速增長。據日本大藏省統計，1951至1984年日本在亞洲四小龍的直接投資額為69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為2億美元。從1985至1990年，日本對四小龍的投資

額更急劇上升到16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27億美元。到90年代初，日本已成為台灣和韓國最主要的資本和技術供應國，日資在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中已和美資並駕齊驅，並有超越之勢<sup>④</sup>。可以說，日本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形成了四小龍最初的競爭力。韓國從1963年起，也進入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期。與此同期或稍後，新加坡、台灣、香港也陸續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

中國向西方引進技術最早開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洋務運動，以政府為背景的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馬尾船政局、漢冶萍煤鐵公司等形成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工業雛形。二十世紀前五十年，民族工業和外國直接投資面臨的是動蕩的社會環境，只能在一場又一場戰爭的空隙中掙扎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進行了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156個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化基礎建設，但不久就受到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衝擊。知識傳播和經濟發展，仍然只能在夾縫中找空間。

1978年，正值東亞經濟增長處於第二波的高潮，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從傳統的自力更生走向全面的對外開放。其第一步，就是大量地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全國各地都引進了一批達到世界80年代先進水平的工業企業項目，像上海的寶鋼、金山石化等。80年代中國進口了100多條彩電生產線、100多條冰箱生產線、55家化纖地毯生產廠……從大多數年份看來，都是進口大於出口。由於大量的技術引進，中國的產品水平和生產技術與國外的差距逐步縮小。

在工業企業通過引進實現技術和產品升級的同時，一些原有的技術和設備，亦迅速向當時的鄉鎮企業轉移，形成了知識傳播的另一個梯度，並實現了生產能力的急劇擴大，滿足了改革後突然釋放出來的社會對基本生活品的需求<sup>⑤</sup>。這些地處鄉鎮的企業，經過以後二十多年的知識交流、溢出 (spill over) 和相互之間的競爭、淘汰、重組，到目前為止，已在中國形成了上百個富有競爭力的小商品生產產業群落，如浙江溫州柳市鎮的低壓工業開關生產基地 (產品佔全國市場的60%)、浙江湖州織里鎮的中國童裝之都 (全國市場的20%)、浙江溫州蒼南縣的鋁制徽章 (全國市場的45%)、廣東中山古鎮鎮的燈飾 (全國市場的60%)、廣東東莞清溪鎮的電腦機箱 (全球市場的30%)、河北清河羊絨集鎮的羊絨 (全國市場的80%)<sup>⑥</sup>。由於這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具有極高的專業化程度和質量水平，中國的小商品很快地獲得了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與日本的投資在東亞經濟增長的第二波高潮中所起的作用相似，在東亞經濟增長的第三波高潮中，四小龍對中國的投資起着重要的作用。按1979至1996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的實際金額存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港澳、台灣、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泰國。可以說，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是從四小龍開始的，特別是香港，在1980年代就開始把面臨工資上升壓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中國內地 (首先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然後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台灣和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從90年代初開始也急劇上升 (從地域上擴大到福建及環渤海灣地區)。1991至1993連續三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實

際投資增長率均超過100%，很快取代了日本的第二名位置。中韓兩國於1992年建立外交關係以後，在1992、1993和1994年，獲批准在華投資的韓資企業分別為650家、1,748家、1,849家；實際投資額分別為1.2億美元、3.8億美元和7.6億美元<sup>⑦</sup>。四小龍在中國的投資，提升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在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中，跨國公司既是它的產物，又是它的內在推動力。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在1980和1990年代是試探期。到本世紀初，隨着中國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大大增強，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進世界前列，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急劇增長，到今天，可以說幾乎所有的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都已有投資。和來自四小龍的企業投資不同，跨國公司的投資往往不是着眼於單個項目，而是中國整體市場的開發；不是一個生產或流通環節，而是它在世界市場上的整體配套；不是局限於勞動密集型企業，而是涵蓋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等各個行業；不是地方性的品牌和渠道，而是全球性的品牌和渠道。由於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入，中國市場正在迅速轉變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擁有最新技術、經營理念和品牌的市場。中國的汽車市場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從地域來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目前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

跨國公司往往不惜巨資派遣大批員工到國外培訓，同時也從國外聘請專家來公司傳授知識和技能，如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在開業的第一個十年期間，長期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專家便有107人，短期專家每年平均也有

隨着中國加入WTO，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大大增強，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進世界前列，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急劇增長，中國市場正在迅速轉變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擁有最新技術、經營理念和品牌的市場。

200多人次。許多跨國公司還在中國設立自己的研發或教學培訓中心。如微軟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1998年投資8,000萬美元，在北京設立微軟的中國研究院 (以後改名為亞洲研究院)。英特爾 (Intel Corporation) 1998年在中國設立研究機構，2000年成立中國實驗室，2004年擴大為中國研究中心。摩托羅拉 (Motorola, Inc.) 1993年成立中國研究中心，1999年擴大為中國研究院，下屬18個研究中心，2,000多名員工，幾年中共投入研究開發經費6億多美元。每一個跨國企業的周圍都有一大批本地企業在為它們提供各種配套服務，形成一個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擴散中心。

與東亞經濟奇跡第一波的日本和第二波的四小龍相比，第三波中的中國對外資直接投資的開放度更高，國內市場的容量更大，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盈利期望更高，進入的廣度和寬度更大，知識和技能傳播的速度更快。從2001年以來，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長均在20%以上，外貿順差逐年增長，2007年上半年達到1,125億美元，比上年上升83%。而中國的出口中，60至70%都是通過跨國公司和外資公司進行的<sup>⑧</sup>。因此，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是跨國公司把中國製造的知識等級一下子拉上了世界水平，是跨國公司促進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升級的最後一步<sup>⑨</sup>。

## 二 政府經濟發展政策措施轉移的「雁行模式」

激勵還是阻礙人們獲取和傳播信息和知識，取決於政策和制度。在東亞經濟奇跡中，可以看到的另一個共

同現象是，各個經濟體的政府都在努力地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以此來推動吸收國外的技術和知識。這是另一方面的知識互動。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經濟發展政策的「雁行」的結果。一些在先發經濟體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很快地被後行的經濟體中的政府模仿和採用。特別是由於具有後發優勢，後進經濟體在使用這些政策的力度、範圍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等方面更有進一步的改善。世界銀行等許多國際組織，對東亞各經濟體的政府管治能力都有好評。據2006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 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報告》披露，2006年世界各地政府的 (管理) 效能排名，中國政府已上升到世界第十七位，超過居第二十四位的台灣。

### (一) 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近代的世界歷史表明，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事例。經濟發展首先是依賴高投資和消費與出口的發展，加上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其次，是高效的政府和務實的領導。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架構裏，往往有可能因社會目標的分歧，導致政府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大多數的東亞經濟體都是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戰爭或動蕩時期後，才走上社會穩定的經濟起飛期。渴望穩定的社會共識，給政府實行優先發展經濟的政策提供了機會；而經濟發展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進一步為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基礎。

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是自民黨長期執政、勞資關係緩和、政治

在東亞經濟奇跡中，可以看到的一個共同現象是，各個經濟體的政府都在努力地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以此來推動吸收國外的技術和知識。

衝突較少的時期。韓國經濟開始起飛的時期，是在1961年朴正熙軍事政變上台，到他1979年遇刺身亡期間。台灣經濟起飛是在國民黨實行戒嚴令期間。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人民有自由，但沒民主。新加坡雖然在1965年才立國，但在50、60年代，各種政治思想的衝突、族群的衝突，使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非常重視社會的穩定，也比較容易在較長時間裏在議會中保持絕對優勢。中國更是這樣，從1978年後，中國政府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一手搞改革開放，一手抓保持穩定，贏得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最長的穩定時期。有穩定，才有知識的傳播，才有經濟發展。正如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說，在現代化的起點上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有權威的國家政權<sup>⑩</sup>。

## (二) 敞開大門，全面開放

二次大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在美國的軍管之下，別無選擇地向西方的知識、觀念、技術、資金等敞開大門。但是，對處於第二波的經濟體來說是否也需要這樣做？60年代，在後發展中國家中的主流意識是「不平等貿易論」等左派思想，自主發展和進口替代是時髦政策。剛獨立的新加坡，沒有工業基礎，沒有腹地，沒有經濟增長點，被迫「反潮流」地敞開大門，歡迎外資進來，採取出口導向的政策<sup>⑪</sup>。韓國在50年代採取的是進口替代政策。60年代初，張勉政權為克服經濟困境而試圖引進日本資本，結果遭到國人的一致反對而被迫下台。此後，朴正熙政權雖憑藉鐵腕，恢復了和日本的邦交，並引進了

日本資本，但也是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冒了很大的風險<sup>⑫</sup>。

中國在1949年以後，長期實行的是自力更生的方針。西方的知識、文化、技術，在很長時間裏都被看作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是顛覆國家政權的洪水猛獸。鄧小平看到日本和四小龍的發展成果，在1979年3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1984年，面對着許多對舉辦特區、實行開放政策的不同意見，鄧小平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現在的特區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sup>⑬</sup>從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持續努力十多年，終於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步入對外開放的全新階段。

## (三) 制訂發展的重點和促進措施——產業政策

日本是東亞經濟中採用產業政策，利用後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的先行者。日本認識到本國資源稀缺，必須使有限的生產要素盡快配置到效益較高的部門。通過學習其他國家的知識和經驗，政府制訂產業政策，誘導企業將資金投向重點產業。例如通產省在60年代初的「重化學工業設想」、70年代初的「發展創造型知識密集型產業設想」等。在東亞奇跡第二波中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都仿效日本，採取了類似的政府政策。

在80年代中，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和日本的經濟學家如小宮隆太郎等，

日本是東亞經濟中採用產業政策，利用後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的先行者。通過學習其他國家的知識和經驗，政府制訂產業政策，誘導企業將資金投向重點產業。韓國、台灣和新加坡都仿效日本，採取了類似的政府政策。

蘇州新加坡工業園是一個管理知識轉移的典型例子。1994年2月，中新兩國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引進了裕廊工業園的建設和管理經驗，也帶來了品牌效應和客戶，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各地的工業園區發展提供了一個典範。

每年都定期舉行學術討論會，學習日本的知識和管理經驗，探討如何既發揮中國原有的統一運用資源的能力，又把握好在轉軌經濟中的度，讓企業和市場逐步在資源分配中起更大的作用。這一學習過程，不僅幫助政府形成了產業政策的制訂機制，促使在中國的大學裏形成產業經濟和產業政策新學科，而且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士。他們至今還對中央和地方的產業規劃、城市規劃、生態規劃和可持續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sup>⑭</sup>。近十年來，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計劃，愈來愈強調指導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注意形成共識；另一方面，使實施細節精密化、程序化和規範化。在2005年的「十一五」規劃制訂過程中，中央共吸納了412萬人的建議。

#### (四) 建立促進發展的成長點——開發區

1960年新加坡開始建造裕廊工業園，1965年台灣在高雄建立出口加工區，以一站式服務等全新的管理理念和高質量的服務吸引外國投資。事實證明這種方式是有效的，韓國也急起直追，1970年在馬山、俚里等地，設立多個出口加工基地。台灣在70年代又建立了新竹高科技工業園。1979年中國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經濟特區，獲得了初步成功之後，1984年國務院首批批准設立上海的虹橋、閩行、大連、天津、青島、寧波、福州、廣州等十四個開發區，1992至1993年，2000至2002年又批准了第二批、第三批。到2002年3月，國務院批准的開發區共達到五十四個，全國的省級、市級的開發區則有數千個。經過二十

多年的發展，這些開發區已形成了「群雁效應」。各種跨國公司在這兒的投資帶進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使開發區成為推動生產力、科技進步及經濟快速發展的成長點。

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則是一個管理知識轉移的典型例子。1994年2月，中新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協議，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新加坡引進了裕廊工業園的建設和管理經驗，也帶來了品牌效應和客戶。現在蘇州工業園已有900多家外國公司落戶，包括著名的跨國公司，如西門子、三星、松下等。園區佔蘇州4%的面積，提供蘇州15%的生產總值，佔蘇州吸引外資總額的26%。2005年的總產出有580億元人民幣，帶動了整個蘇州和江蘇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各地的工業園區發展提供了一個典範。從園區成立至今，已有五萬多名全國各園區的管理人員和地方政府的領導在園區進行了參觀或培訓。用江蘇省省長的話說，蘇州新加坡工業園之花已開遍全國<sup>⑮</sup>。

#### (五) 建立學習型社會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就把發展教育定為基本國策。在1962年日本文部省的教育白皮書中，就把教育經費不看作是消費，而是看作投資。日本經濟起飛時期的決策人之一，大來佐武郎曾在自傳中說，在他1973年到阿拉伯國家訪問時，看到其石油資源，體會到日本發展經濟「最基本的還是靠人」<sup>⑯</sup>。日本的教育經費，從1950至1972年，增加了25倍。教育經費在政府的行政費中的比重佔20%以上，遠高於歐美國家。日本的大公司都普遍重視對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培訓，日本各

縣更經常舉辦各種職業教育。到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的口號。

韓國在1960年實現了普及小學教育。70年代後，高等教育入學率大概每十年提高20個百分點。政府規定凡僱用1,000名以上員工的企業，必須舉辦培訓機構。許多大企業，如三星、大宇，還都辦起了大學。到1995年，韓國的中學入學率達90%，大學入學率接近55%，達到了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的水平<sup>⑩</sup>。

中國的近代教育到二十世紀初才真正開始萌芽。從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到1999年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1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6.7年。從1990至2002年間，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3.4%提高到14%以上，十年提高10個百分點，以13億人口的總量計，接近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世界平均水平<sup>⑪</sup>。

從1978至2005年底，中國出國留學的人次總數達到93萬人，其中已長期回國工作的人數有23萬人。特別是大批的中國官員曾在國外的著名大學受過系統的培訓。2002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簽訂協議成立培訓班，每年針對六十名地方市級、中央司局級以上、45歲以下的官員進行三個月的密集培訓。培訓的內容包括分析問題的架構和方法，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發展中的五十多個案例，還邀請政界、經濟界的名人主持講座；每年都有上千名中國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都市規劃和環境規劃等。此外，在英國牛津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漢城大學等，都有中國的官員在進行系統的學習<sup>⑫</sup>。

### 三 民主政治發展是否也是在按「雁行模式」進行？

當我們把知識按它們所屬領域分解為技術、管理和政治等幾個部分，東亞經濟體的政府幾乎都共同地對它們採取了差別對待的態度。如果在某一時點上說對技術知識的開放度是100%，則大致可以說對管理知識的開放度是70%，政治知識則是30%。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共同的，隨着經濟的發展，所有領域的知識開放度都在逐步提高。

歷史經驗表明，民主不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東方文明中，儒家用「格物，致知，修身，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道路來培養執政者。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行仁政」，愛民如子，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sup>⑬</sup>。當東亞經濟體的政府採取發展導向的政策，發展經濟使老百姓首先能做到擺脫貧困、有吃有穿，在這一文明中是很容易獲得共識的。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就是這種發展主義思維的最好體現。而對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西方知識，東亞文明一直是抱有懷疑和抵制態度的。早在十九世紀，中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和日本的「和魂洋才」、「學問技術採於彼，仁義道德存於我」等，都是選擇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拋開有爭論的先不談，從沒有爭論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知識引進開始。

但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本身就對政治改革提出許多新的要求：一是隨着總體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社保基金的規模、經濟建設中的土地使用規模都會愈來愈大。對經濟發展中的監控和制約的要

早在十九世紀，中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和日本的「和魂洋才」、「學問技術採於彼，仁義道德存於我」等，都是選擇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拋開有爭論的先不談，從沒有爭論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知識引進開始。

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明，以發展為導向的威權體制，在成功地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激起了民眾對政治民主化的訴求，加速了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化。從這一意義上說，在民主政治方面，東亞經濟體是否也是一種「雁行模式」？

求就會愈來愈高，涉及的面也會愈來愈廣。如中國近年在許多地方查處重大的腐敗和違規案件，雖然國內外普遍叫好，但也普遍認為所揭露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如全國各地的腐敗和違規問題，都要靠這種傳統的由內部寫檢舉揭發信，再由中央派出監管小組、檢查小組來清查的方法，顯然是困難重重，是管不勝管的。現有的監管和制約機制已顯然不能適應。二是外匯儲備的增多，匯率的逐步升值將不可避免，出口的升級、產業的升級，一方面結構性的就業困難會愈來愈嚴重，另一方面向海外投資，企業向海外發展，已不可避免，現有的觀念和體制，不能適應這些變化。三是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消費者主權、納稅人主權等主權意識變得愈來愈強烈，各個階層的人民對政治上的話語權、選舉中的投票權、地方經濟決策、環境決策的參與權和基本人權的保證都會有愈來愈高的要求。四是環境保護、能源節約、科學發展等目標，在目前的單一促進追求GDP增長的制度性結構中是很難實現的。新的發展目標要求有一個新的制度性結構來保證<sup>②</sup>。一個與時俱進的政府和社會，需要適時地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的全面改革來和新的時代相適應。

東亞經濟體在經濟發展後，都先後進行了民主改革。日本戰後就實現了民主化。韓國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艱難實現了民主化轉型。台灣也自1980年代走上了民主改革的不歸路。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明，以發展為導向的威權體制，在成功地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激起了民眾對政治民主化的訴求，加速了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化。從這一意義上說，在民主政治方面，東亞經濟體是否也是一種「雁行模式」？

許多學者指出，今天中國的知識和制度體系，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實際上現在已經是屬於當時所說的「西方」的系統之中。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制度框架，都已經進入當代的世界體系<sup>②</sup>。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6年9月30日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說，中國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國這百多年的翻天覆地的歷史，也就是在各種不同意見、價值取向的衝突中，最終還是走向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歷史。

民主制是現代社會中使用得最普遍、最基本的國家形態。它的基本特徵是：議會制、普選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制和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簡單來說，人民有權選擇政府、監督政府。同時，民主社會具有制惡和保護弱勢群體的機制。

但在華人的傳統概念中，民主是為民作主，是行仁政，是從上往下選擇的機制，讓具有使命感和優秀品質的人執掌各級領導崗位。心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民主是建立在人心向善的基礎上的揚善機制。但是，人心是可變的。在沒有一個制惡機制的制約下，權力會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會使人絕對腐敗。培養和考驗了幾十年的優秀幹部，在短短的幾年，甚至幾個月、幾天、幾小時裏，就可能蛻變為腐敗份子。沒有制約，一個以和諧為目標的揚善機制，就可能蛻變為不斷地產生腐敗份子、把好人變成壞人和充滿着不和諧的偽善機制。

知識是無國界的，知識是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東亞的經濟奇迹顯示了東亞文明中善於學習和吸收知識，善於學習和吸收各種文明成果的優良



傳統。東亞正在沿着這條成功的道路走下去。未來的東亞政治，是否會是東方的揚善機制和西方的制惡機制的結合？又是否會是東方的為民作主的修養體系和西方的民主法律制度的結合？最終使一批又一批知善而從，知不善而改的優秀政治家，在民主的體制中，執掌各級領導崗位，帶領東亞人民為自己，也為全球的未來作更大的貢獻。

### 註釋

① 參見黃朝翰、楊沐：〈知識吸收與東亞文明的興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年4月號，頁134-39。

② 斯蒂格利茨：〈知識經濟的公共政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5期，頁20-28。

③④ 趙文驩、王勤：《亞太經濟新格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20；23-24。

⑤ 楊沐：〈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蹟——30個鄉鎮企業調查的綜合分析〉，《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11月，頁1-9。

⑥ 郭利平：《產業群落的空間演化模式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頁27-28。

⑦ 崔新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1），頁4-16。

⑧ 一些著名的跨國公司如沃爾瑪（Wal-Mart），IBM等都把他們的全球採購總部轉移到中國。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在2004年，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如筆記本電腦、手機、數碼相機等，總值1,800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149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⑨ 參見王志樂主編：《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報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王志樂主編：《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

⑩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

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7。

⑪ 90年代初，筆者榮幸地在當時的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執行主席吳慶瑞博士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吳博士曾任新加坡的副總理，是李光耀先生在經濟決策方面的主要助手。我們曾多次聽他講過新加坡建國之初，不得不採取引進外資政策時，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風險。

⑫⑬ 陳龍山等：《韓國經濟發展論》（北京：科學社會文獻出版社，1997），頁45-57；194-202。

⑭ 新華通訊社國內資料室編：《十年改革大事記，1978-1987》（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頁334-36。

⑮ 楊沐：《產業政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89），頁1-34。

⑯ 《海峽時報》，2006年10月16日。

⑰ 大來佐武郎著，丁謙等譯：《東奔西走——一個經濟學家的自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頁98。

⑱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21-23。

⑲ 周惠菁：〈中國官員海外學習熱〉，《天下雜誌》，2006年第347期，頁44-57。

⑳ 羅榮渠認為，儒家的政治思想是愛民如子，保證黎民不飢不寒，也即是現代的保證人民的基本生存權，通過發展來脫貧，這是各東亞經濟在發展初期的共同目標。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續篇：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90-93。

㉑ 許多經濟學家多次指出，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是要建立一個新的體制基礎。參見吳敬璠：〈經濟增長模式與技術進步〉，《科技管理》，2006年第3期，頁8。

㉒ 趙立彬：《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20世紀20—40年代的全盤西化思潮》（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1-9。

楊 沐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國合作項目協調人